

增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

宋林飞

提要: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加强和改进理论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在学习体会到,必须进一步增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具体路径是:立足中国,构建新时期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风格;把握当代,认清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注重创新,从多种资源中提炼标识性概念;面向未来,打造易于接受的社会学原创性理论观点。

关键词:社会学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 标识性概念 原创性理论观点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加强和改进理论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相比之下,我们社会学研究在反映与支持实践方面的努力和深度还远远不够,特别需要通过更大力度、“接地气”的理论创新,进一步增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下面谈几点学习体会。

一、立足中国,构建新时期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风格

现代社会学发源于工业化先行的西方国家,来到中国这块土地以后经过了引用、改造、创新的历程。现在中国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既可以与世界各国社会学者对话,又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国特色还不够鲜明,需要立足中国实际,建构具有更强创造力、解释力与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

(一)新时期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来自改革发展稳定三大主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习近平,2016)。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可以概括为改革、发展与稳定。这是新时期中国实践的三大主题,是社会学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的来源。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例如,如何“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习近平,2014a);如何“坚持把改

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习近平,2014b:68)。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为增强新时期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发挥作用。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理论创新的主要源泉。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深层次攻坚”的改革实践,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积累了丰富材料。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需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现代化。

发展是社会学的传统议题。社会学者们往往乐意考察和反思社会发展与变迁。以“中国经济奇迹”为标志的“中国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面貌。这不仅是中国发展自身的成功经验,而且对世界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应加强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和道路的研究,从中提炼出更多有学理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

稳定是大局,既表现为社会整体结构的稳定,也表现为群体、组织、社区、制度等构成要素的稳定。分析总结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发生机理,探索建立社会稳定长效机制,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有创造力的思路,是中国社会学应有的担当。

(二)新时期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来自中国发展新理念

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需要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观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解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概念、新观点与新理论。邓小平同志阐述了关于“中国道路”的重要思想:发展才是硬道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这些论断为新时期中国发展厘清了思路。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中,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义。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系统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辩证关系,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联动的发展趋势,是新时期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他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显然,这里明确了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

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新时期我国发展取得卓越成就,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对于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聚焦突出问题、补齐实现全面小康的短板和拓展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格局新面貌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从全面发展理念中不断吸取营养,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就会越来越鲜明。

(三)新时期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来自继承借鉴和创新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土社会”概念,总结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他用“差序格局”描述了中国社会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格局,形成了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社会学概念;他以“文化自觉”思想提示我们,要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保持觉醒,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对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等有正确认识。雷洁琼先生推动社会学“中国化”,重视中国城乡家庭研究,关注教育和妇女儿童发展,为我国教育立法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杭生先生提出“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努力创造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从文化自觉到理论自觉,都是中国社会学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要进一步加强分析与鉴别,对于国外社会学概念与观点,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不要生搬硬套。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中国社会。中国学者们关注新时期的三农问题、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会风险、特定群体、文化变迁、民族地区、虚拟社会、社会网络、社会心态、社会组织与社会政策等,开拓了一些鲜活的社会学议题。

(四)新时期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是求实科学与管用

求实是一种方法论,就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聚焦我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成功解决新问题中产生新认识,关键就看它直面问题的程度、解决问题的深度。不要言必称西方社会学家怎么说,要说些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的话。在话语体系上求实,就要从活生生的实践中提炼社会学范畴、观点,让这些范畴、观点能够观察分析现实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应具备科学的特征。科学就是对经验现象与社会事实的正确判断,是对社会的客观反映,就是具有描述、解释

和预测功能的知识体系。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的科学水平。

经世致用、服务社会,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应坚持的重要原则。我们的概念、观点、理论要管用,强调管用不是实用主义,管用的标准是能够说明世界、改造世界。社会学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就是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和成果大兴天下。要加强智库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制定出台社会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二、把握当代,认清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出现了协调发展的基本态势。认清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会更加自觉地增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

(一)城市社会来临,城镇化面临新的挑战

近30年来,我国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3.73%,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当前,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但不能再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

推进新型城镇化仍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尚未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污染严重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城市管理服务面临新挑战,“城市病”仍在蔓延。解决这些问题的动力在于深化改革,坚持以人为本、绿色、集约的城镇化道路。关键是要让农民工“进得来、稳得住、能发展”,建立起美好生活和职业生涯预期,真正成为城里人。

(二)服务社会来临,工业化向后期过渡

新世纪之初,我国工业化总体处于中期阶段,从社会形态来看已经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2013年末,全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全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比例为38.5%,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比例,连续3年在

三个产业中就业占比最高,进入向工业化后期加快转变的时期。2014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9.5%;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9.9%;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0.6%,吸纳就业首次超过四成,成为社会主体。

当前,全国就业结构继续呈现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将日益明显。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高是国家发达的重要标志,2014年美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75.3%,法国为72.4%,日本为68.1%,韩国为55.1%。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也是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从工业社会转向服务社会,是后工业社会来临的重要特征。

(三)信息社会来临,社会生活方式变化加快

目前,我国网络技术与载体日益普及,线上线下互动日益频繁,已经迈向信息化发展新的阶段。2012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总指数为0.756,成为全球信息化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4年,我国主导制定了云计算、物联网、射频连接器、同轴通信电缆等领域的国际标准,对我国与世界信息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正在引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信息化正在形成高效率、跨时空、多功能的网络空间,网络社会、在线政府、数字生活成为现实。网络教育、在线娱乐、虚拟养老院等新方式正加速形成,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和知识扩散功能进一步强化。电子商务、O2O、物流配送等新业态进入经营、消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微信等网络社区人头涌动,自媒体日益普及,公民直接发布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在社会定量研究领域,大数据的引入是收集和分析资料方法的创新。我国社会进入了基于信息网络的大创新、大变革时代。

(四)消费社会来临,社会环境需要加快改善

近几年来,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为66.4%,远远高于投资贡献率。消费经济的崛起,不仅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进程产生着深远影响,也将推动消费社会的发育与形成。应积极引领消费社会的发展。

发挥消费在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正功能,需关注消费的文化

意义、阶层差异、集体性仿效以及消费者社会责任。特别是要加强消费社会病的诊断,纠正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扭曲,消除奢侈消费之风及其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防止消费文化迷失,批评炫耀性的消费竞赛;注意奢侈品消费的社会排斥,保护大众消费者利益;打击来自大众传媒的虚假广告、网络传播与交易带来的消费欺诈。应增强社会信用,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安全放心、公平诚信的消费社会环境。

(五) 老龄社会来临,人口老龄化不断提速

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的世界性趋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更加显著。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2%。按照联合国的两个标准,中国均已进入老龄社会。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转为老年型的进程长达几十年至一百多年,而我国只用了短短的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也需要积极应对。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15.5%,其中20%左右是失能、半失能老人。

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是老年社会,养老服务工作越来越重要”(兰峰、胡斌,2014)。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14次提及“养老”这个关键词,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老龄化问题高度重视。最近习近平同志又召开了人口老龄化专题会议,要求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强调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一些调查表明,多数老年人有条件且习惯居家养老,需要建立社区养老服务平台,形成政府引导、社区主办、社会共同参与的为老年人服务的机制和格局。

(六) 社会利益调整期,社会风险有所加剧

当前,我国社会总体是和谐稳定的,但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还没有根本转变,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仍然比较多。2014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为0.469,仍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201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2:1,如再加上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农村生产成本的支出、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等因素,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别可能会更大一些。收入差距带来的群体利益分

化与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的社会风险因素。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社会发展面临新的问题,群体性事件、非利益相关性社会冲突增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进入了调整期。在这种情况下,创新社会治理应以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为依归,建立社会矛盾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三、注重创新,从多种资源中提炼标识性概念

面对新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社会学概念现在已经不够用或者不解渴了,需要更多与时俱进的社会学概念来分析与解释。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意见,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增强社会学解释力与影响力。

(一)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提炼标识性概念

1. 关于“公平正义”的概念

公平正义是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马克思第一次把公平正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避免空谈,指出公正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实现公平正义首先是要起点公正,即社会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同时,过程公正、结果公正,每个劳动者都应当有获得正当利益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实现代际公正,要求任何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都不应当以损害同代人以及未来人的利益为代价。不平等是一切社会问题与矛盾的根源,应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消除社会问题的根源。

2. 关于“共同富裕”的概念

邓小平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阐述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373)。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而且是社会主义本质。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阐发,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富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了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具备了更加重大的社会学意义。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要让少数地区、

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多数人也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在我国已经处于先富带后富的关键阶段,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我国贫富差距仍然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具有特别重要的迫切性。

3. 关于“改造社会”的概念

现代西方学者往往以“价值中立”为理由,即使已经从经院步入田野和经验世界,仍然宣称自己只扮演观察者的角色。然而,马克思对此却明确回应:“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1960:6)。毛泽东同志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毛泽东,1993:269)。这是对现实采取的一种“介入”的理论观点。当代中国社会学高度重视社会改革、稳定与发展的经验研究与理论思考,越来越关注设计未来。不仅回答社会现在是一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还回答社会应该怎么样的社会学理论是一种全面的理论。我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将关于社会应该怎么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观点称之为“介入理论”(宋林飞,1997)。这种理论更注重在现有的社会秩序框架下,对未来进行“干预”和“规划”,颇有启发意义。

(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中提炼标识性概念

1. 关于“小康社会”的概念

“小康”、“大同”,是中国人古老与美好的梦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平,1994:237)。小平用中国古老的小康概念,描绘了实现从贫困向温饱、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宏伟蓝图。他热情展望的“小康的状态”、“小康之家”、“小康水平”、“小康社会”,成为中国人民不断进取与追求的奋斗目标,并且开始将世世代代的梦想逐步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其中,“小康社会”成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中提炼出来的最重要的概念。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是使得所有的人都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太穷的人,日子普遍好过,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由之路。他曾经明确提出“小康社会”,并称它为“新概念”。新概念引发新理论与新实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两个百年目标”之一,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动力。

2. 关于“和谐社会”的概念

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底蕴深厚。崇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中西周史伯的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了探讨(左丘明,2009:200)。孔子丰富了“和”的内涵,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见《论语·子路》)。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为我国社会稳定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为中国社会学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机遇。国内外均有人问我,和谐社会前面为什么加社会主义?我认为,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制度条件,这个制度条件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改革发展中的新制度条件。

3. 关于“经世致用”的概念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布局变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新格局。如何推进社会建设?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可以有多种答案: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全方位优化社会的整体结构,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为基础,逐步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社会利益格局,通过加强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协调,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保障,建立面向全体国民、同时又涵盖社会生活基本领域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让群众共同体参与社会再分配和提供公共服务,并最终建立社会共同体。

社会建设主要任务是建构合理化的社会秩序,以达到社会繁荣、百姓安乐的局面。这种观点来自我国古代经世济民、务实求新的社会思潮。孔子删述六经,怀救民水火之心,认为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主张经世致用,密切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务当世之务,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不蹈袭古人,贵在创新,别开生面。志在扶危定倾、斡旋气运,利济百姓。到了晚清,康有为等重新张扬经世致用的口号,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自强之路,苦心孤诣地设计种种社会改革方案。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梦的魂与

根,“经世致用”这一鲜明的中国概念,在推进现阶段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社会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

1. 关于“社会运行”的概念

郑杭生先生提出了三种类型的社会运行: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相互促进,而社会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相对最小的范围和最低的限度之内,这种社会运行状态称为良性运行;当社会运行有障碍,发展也不是很均衡,包含了比较明显的不协调因素,但它们还没有危害到社会的常态,那么就是社会中性运行;当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障碍,甚至出现离轨、失控情况时,就称之为社会恶性运行(郑杭生,1986)。他将社会良性运行作为目标追求是正确的。我在《现代社会学》(1987)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运行的两个衡量和评价标准,即协调程度和发展程度。决定社会运行状态的各种内在因素都是一些极为活跃的变量,因此“协调—不协调—新协调”的周而复始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图式。而发展程度评价,不仅要看发展水平,还要看看发展遵循的目的,以及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什么。我国社会学者开拓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社会风险与预警等,为社会运行研究注入了新议题。

2. 关于“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概念

新时期中国社会学者普遍对贫困与低收入者较多的传统“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表示忧虑。我在《“中国经济奇迹”未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结构最稳定。“扩大中等收入层与准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宋林飞,1995:623)。此后,我发文指出,我国社会学者在研究社会稳定的过程中,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结构的稳定性是最大的稳定性,为了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首先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宋林飞,2007)。陆学艺先生长期关注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认为阶层已经分化,社会结构要及时调整,需调整社会经济政策。他指出,现在的社会结构总体来说还是洋葱型,但是洋葱的底部变小了,中间变大了。1999年中产阶级大致占15%,2008年是22%—23%。他主张壮大中间阶层的力量(新华网,2009)。李培林认为,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除了政府干预、市场调节两只手外,还存在社会结构转型这只看不见的“第三只手”。他强调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要性

(李培林,2007)。因此,努力建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成为了中国社会学者的一个理想型目标。

3. 关于“社会治理”的概念

从1998年到2013年,社会管理多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起初把社会管理纳入政府职能,任务在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随着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管理就突破了过去单一的政府全包模式,开始向政府、社会和公民协同管理转型。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代替了社会管理。从“管理”走向“治理”,背后是我国新时期深刻变化的社会结构,是日益发展的社会组织,是高涨的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是公民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因此,应放弃单一主体改为多元参与、变自上而下为自下而上、摒弃命令改为合作商量,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从国外社会学成果中提炼标识性概念

1. 关于“社会流动”的概念

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把社会流动定义为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的转移,这些位置主要包括阶层、职业、教育、收入和福利以及户籍等。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与社会分层体系封闭或开放的程度密切相关。社会流动实际上是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如果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位置间能够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自由的流动,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也有可能丧失自己的优势地位,那么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将比较合理和公平。在社会学研究中,合理的社会流动通常被作为社会结构是否开放和机会平等的指标,反映不同社会位置之间是否存在阶层壁垒。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流动模式日趋合理,社会流动加快,代际上升流动率明显提高,形成了社会开放度较高的社会。李强关注社会分层,认为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和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开始严峻,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李强,2004)。我认为,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的根源,是利益固化、社会流动减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是现阶段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

2. 关于“公共责任”的概念

国外一本比较流行的社会学教材提出,人与人之间或和谐相处,或

互相冲突,或漠不关心,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和谐、冷漠与冲突,是三种主要的社会关系。社会进步表现为减少冷漠、化解冲突、增加和谐。化解冲突、减少冷漠,是加强社会建设、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目前,应关注我国社会存在的一定程度的领导冷漠、雇主冷漠、富人冷漠、强者冷漠、城市冷漠等等。消除这些冷漠,像雷锋一样“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就会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的进程。应增强人们履行公共责任的热情,克服“陌生人社会”的弊端。现阶段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劳资纠纷、环境保护、拆迁征地、执法不当等。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责任。

3. 关于“风险社会”的概念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现代社会不仅仅生产财富,还生产风险,而且风险问题凸显;财富累积于上层,而风险聚集于下层。风险社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如何防止、减少或疏导现代化所产生的风险和危险?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贝克等西方社会学家并没有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答案。当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候,美国学者福山趁机把“美国生活方式”看成是历史终结的标志,把美国称之为“全人类的国家”。真实的世界并非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世界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显著,出现了疏导风险的中国方案。几年前,福山发表了题为《衰败中的美国》的长文,标志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在西方社会学家那里,风险社会的“社会”是民族国家的社会,但当代国际社会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正在加剧。当年美英等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发动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近年来,美国以“航运自由”为名在南海耀武扬威,以防止“军事化”公然干涉中国主权与海洋权益。失控的世界、严重的国际社会风险,其根源来自于霸权话语、帝国思维及其引发的战争。我们必须把这份清醒与警惕纳入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

4. 关于“美好社会”的概念

1958年,在美国后工业社会来临之际,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出版了《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赞美了美国私人经济的繁荣与物质产品的丰富,同时也指出了公共品匮乏的问题。1962年,迈凯耳·哈林顿出版了《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一书,

揭露了美国贫困与落后的一面,美国总统肯尼迪读过该书以后意识到了美国贫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决心发起一场反贫困斗争。我曾先后看过这两本书,我接触与交流过的美国社会学家也都认为,美国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还很严重。加尔布雷思同样在《美好社会》一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并非完美无缺,垄断无法保证美好社会的经济稳步运转,私有化一无建树(加尔布雷思,2009)。美好社会是加尔布雷思的向往,并不是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概括。我们要建成一个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安定和谐、人民满意度高的社会主义美好社会。

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奥林·莱特(Erik Olin Wright)认为,要发掘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解放潜力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并且进行推广,最终这些制度将在各个社会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将逐渐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些理论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西方中心论不愿承认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成功,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从未完全接纳中国。中国应积极参与构建全世界人民都能安居其中的世界秩序。

四、面向未来,打造易于接受的社会学原创性理论观点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的源泉是中国大地上活生生的实践。要善于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潜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中国社会、国际社会易于理解接受的新观点,构建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相结合的新理论。

(一)打造中国社会易于理解接受的新观点新理论

1. 关于小城镇的理论观点

这是中国社会学者接地气的理论观点。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先生提出,小城镇是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到小城镇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还不理解小城镇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怎样的一个概念。“三农”问题的出路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加快小城镇建设。我国农村普遍人多地少,大量劳动力需要转移。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小城镇聚居,发展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被称为“离土不离乡”;一部分劳动人口有组织地定期从本乡外出,被称为“离乡不背

井”。这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搞活人口这盘棋,需要做两个棋眼。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研究方法,摆脱了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而注重实地调查。前几年,我在东中部地区多个省份进行了城镇化调查,发现有些地方盲目扩张城市规模、浪费土地资源、种地农民“被上楼”等,有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所以,我十分赞成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2. 关于共享发展的理论观点

“共享”是中国古人的话语。据明代冯梦龙记载:“(齐)景公曰:‘相国政务烦劳,今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声,不敢独乐,愿与相国共享。’”(冯梦龙,2015:791)在新时期,这个概念最早来自离退休人员,他们对现职干部说,希望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现在共建共享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新的发展理念。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解决贫富差距悬殊、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产品供给不均等问题。坚持共享发展,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共享发展理念回答了“发展目标是什么和发展成果如何共享”的问题,体现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3. 关于反腐败的理论观点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习近平,2014c)。腐败严重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大量财富,蛋糕做大了,分配却出了问题。官员非法致富的渠道主要是权力寻租。官员掌握审批权和资源支配权,一旦抵挡不了金钱的诱惑,就会以权谋私。应有严格的制度约束,才能避免腐败。“不在河边走,就能不湿鞋。”那就要在堤上走,这个“堤”就是权力运行的监管平台,是公开约束机制与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机制。要遏制公权力的滥用,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二) 打造国际社会易于理解接受的新观点新理论

1. 关于和谐世界的理论观点

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总体而言,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主要潮流,但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区域分裂主义仍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国社会学者应加强国际社会与国际问题的研究,关

注全球化与反霸权、新帝国主义、国际社会运动、反恐怖主义等议题。西方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沃勒斯坦等人的观点,总体上以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格局为基础,强调对抗性的国际关系。中国社会学应解释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和而不同”理念,阐述胡锦涛同志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阐述习近平同志关于“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的国际社会理念。中国社会学将在概念和理论创新上更充分地体现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故事,争取更多的国际认同。建设和谐世界的进程,就是不断解决矛盾、增加和谐因素的进程。中国社会学界要在反霸权、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等方面构建具有专业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2.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观点

共同体是社会学的经典概念,为国内外学界广泛接受,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要认真解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也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不再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着眼共同体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共同利益,转变国家关系的零和博弈思维,重建国际社会的相互信任。中国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崛起大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习惯于用冷战思维应对快速发展的新型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平和发展的潮流时刻受到战争和冲突的威胁。我们何以共存?这是困扰全球社会学家的一个重要命题之一。对于这一世界性风险的管控研究,是中国社会学解释国际难题的重要任务。同时,应对暴力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难题。自“9·11事件”之后,新形式的恐怖主义引发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关注。中国社会学要构建安全社会学专业话语体系,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应对恐怖主义与犯罪集团、国际关系、民族宗教关系、意识形态安全、信息安全、核安全等多个领域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不断创新和发展国际、国内安全理论和反恐斗争的理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处理大国关系时将面临“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正视这种风险,努力避免陷入这一陷阱。中国现代化进程不能被打断。

(三)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新观点新理论

1. 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观点

有些社会学者使用“结构紧张”、“社会断裂”等概念,来观察与解

释社会矛盾问题。“利益协调”、“凝聚共识”也是必要的分析概念。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的形成与演化有一个四部曲：利益摩擦、共识不足、结构紧张、社会断裂。其中，共识问题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防止与避免结构紧张甚至社会断裂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增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价值共识，在多样性中求得更多、更稳定的一致性。利益协调、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是筑牢一致性与多样性结合的主要途径。要善于变泛价值认同为核心价值认同，重在培育社会主流价值。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既要允许存在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社会群体及其多元的价值观，也需要形成共识、凝聚力量的核心价值观。

2. 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观点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潮流，“小康”是“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温饱是现代化准备阶段，小康是初步现代化阶段，基本现代化是中度现代化阶段，还有高度现代化阶段。2015年，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书中提出了“中国现代化三阶段说”：第一阶段，到2020年，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初步现代化；第二阶段，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有，基本实现现代化，即实现中度现代化；第三阶段，到2080年，达到高度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普遍富有，实现高度现代化（宋林飞，2015）。可望提前实现第二、三阶段的目标。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习近平，2012）。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迈入更高发展阶段，我们不能忽视“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地发展”（钱彤，2014）。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利益关系与格局调整，着力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有效防范社会风险，就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冯梦龙，2015，《绣像东周列国志》，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 加尔布雷思,约翰·肯尼思,2009,《美好社会》,王中宏、陈志宏、李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兰峰、胡斌,2014,《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纪行》,《福建日报》11月17日。
- 李培林,2007,《关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若干思考》,《红旗文稿》第18期。
- 李强,2004,《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 马克思、恩格斯,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93,《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钱彤,2014,《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人民日报》11月11日。
- 宋林飞,1987,《现代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5,《“中国经济奇迹”未来与政策选择:国际市场的挑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1997,《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07,《优化社会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015,《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习近平,2012,《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报》11月30日。
- ,2014a,《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平衡点》,《人民日报》7月9日。
- ,2014b,《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 ,2014c,《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月15日。
- ,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5月19日。
- 新华网,2009,《独家专访陆学艺:中产阶级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8/17/content_11894452.htm)。
- 郑杭生,1986,《社会学对象问题初探》,《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左丘明,2009,《国语》,南京:凤凰出版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杨可